

《南部新书》小考

虞云国

《南部新书》是北宋钱易所著的一部笔记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说其“皆记唐时故事，间及五代，多录轶闻琐语，而朝章国典因革损益，亦杂载其中。故虽小说家言，而不似他书之侈谈迂怪，于考证尚有裨”。这一评价大体是符合实际情况的。该书有过两种标点本，一收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出版的《中国文学参考资料丛书》，收入2000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《唐五代宋笔记十五种》。近日笔者因工作之需，深入查阅了有关资料，发现时隔四十余年的两个整理本，对该书作者生卒与版本源流都语焉不详。故不揣浅陋，草成此文，以就正大雅。

一、作者生卒考

钱易，字希白，临安（今浙江杭州）人。《宋史》、《东都事略》、《隆平集》皆有传。他是五代吴越王钱镠的曾孙，少年即以歌诗知名于世，大受苏易简称赏。咸平二年（999）进士。景德三年（1006）再举贤良方正科入等，历任直集贤院、知制诰、翰林学士等职。他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惟有《南部新书》十卷和《洞微志》一卷本（原为三卷）。

关于钱易的生卒年，台湾王德毅所编《宋人传记资料索引》和各种工具书皆无考。先考钱易的卒年。《宋史》本传仅说他“为翰

林学士，僦直未滿，卒”。僦直之义稍僻，据《翰林志》云：“初入学士，当直之数外，更有僦直，各有等第数目”，是初任学士时额外当班的意思，可见钱易应该死在出任翰林学士以后不久。其任翰林学士之年，《四库总目提要》误以为是真宗朝，整理本也承袭此说。《皇朝事实类苑》卷二十四引钱惟演《金坡遗事》云：“钱希白于予为从父兄也，天圣三年（1025）十二月，予忝钧衡之命，时希白当制，世称弟拜相，兄草麻，自古未有。”《咸淳临安志》卷六十五载钱易传所记略同，惟续云：“僦直未滿而卒。”《宋会要辑稿》职官三之一四、六之六十八俱在仁宗天圣三年下载“会擢钱易为学士”，则其卒当在天圣三年十二月或其后不久。而据宋代佚名《学士年表》天圣四年下载“钱易，正月卒”，其卒年正与“僦直未滿”之说契合。则其卒年当为天圣四年（1026）。

关于钱易生年则记载歧出，莫衷一是。《隆平集》卷十四和《东都事略》卷四十八都载其卒年为五十九，似无疑问，则生年当为开宝元年（968）。但《宋史》本传说：“（钱）易年十七，举进士，试崇政殿，三篇，日未中而就。言者恶其轻俊，特罢之。然自此以才藻知名。”《隆平集》和《东都事略》记钱易其事的年岁与《宋史》相同。而此事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三十三系在太宗淳化三年（992）三月戊戌条：“上御崇政殿覆试合格进士。内出《卮言日出赋》题，试者骇异，不能措词，相率扣殿楹上请。会稽钱易时年十七，日未中，所试三题皆就。言者指其轻俊，特黜之。”《文献通考》卷三十《选举考三·举士》和《宋会要辑稿》选举一之四所载年份、内容与《长编》相同。既然钱易举进士的可靠年份可以确定在宋太宗淳化三年（992），而这年他年十七也为多种史料所公认，则钱易应当生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（976）。倘若如此，钱易享年仅五十一岁，即其生卒年应为976—1026。但《隆平集》和《东都事略》本传所云“卒，年五十九岁”，就大有问题，惟有两传所载“年五十九”疑是“年五十一”的传刻之讹，

才不相矛盾。

《全宋诗》钱易小传据《新编分门古今类事》卷七《钱公自述》条支持生年为968年说。兹转录《钱公自述》有关文字如下：“余淳化三年落第尧阶之下，便卧病于京师。五月六日，伏枕困睡，忽梦有老道士，请登一红泥坛，握手曰：‘成名二十六，章服二十九。’时年二十二。心极喜，谓果然，则进趋稍达也。无何，十年词场不开。咸平元年，又以期服免。咸平二年方叨第，时已三十二矣。意疑梦之无证，细思而后得之。云二十六，非二个十六乎？隐密神告之言，其前定若此。”此条摘自《洞微志》，但不见于《洞微志》至今仅存的《说郛》本，当是佚文。钱易正式中进士确为咸平二年（999），倘据此条自称为三十二岁，则其生年为968年，应属无疑。但《洞微志》本为小说家言，其中所说是否确切无误则大有疑问。本条即颇与史实抵牾。淳化三年（992）以后到咸平元年（998），宋朝确停科举，但连头带尾亦仅七年，何来“十年词场不开”，故他自称淳化三年“时年二十二”，即难征信。因此，仅以这条自相矛盾的小说家言坐实钱易生于968年，而排斥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等史料的不同记载，似有失偏颇。故钱易卒年在未发现新史料之前，似应持968年或976年两说为宜。

二、版本源流考

关于《南部新书》的卷数，钱易之子明逸的序称“成编五，列卷十”。南宋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作五卷，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转录晁志；而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作十卷，其后各家书目著录皆同陈录。《四库总目提要》指出：“今考其标题自甲至癸以十干为纪，则作十卷为是，公武所记殆别一合并之本也。”周中孚《郑堂读书志》则认为晁、马两家“误以册为卷也”。因迄今未见宋本流传，这也只能是猜测。

关于《南部新书》的版本，张海鹏在刊刻此书学津讨原本时

指出：“此书宋槧已绝，久无善本可知”；而《四库总目提要》提出：“世所行本，传写者以意去取，多寡不一。”其版本源流有两大系统：一为节本系统，一为足本系统。

先说节本系统。黄丕烈的《尧圃藏书题识》指出：“《南部新书》旧钞本传录甚多，大都出于洪武时清隐老人所跋本，然十卷中删削过半，即有补遗，亦未之备。”也就是说，附有一卷补遗的反而属于“删削过半”的节本系统，而这一系统无不出自明洪武五年清隐老人的题跋本。黄尧圃还说到，“近从白堤钱听默借录一本，较摘本颇备，然脱落讹谬，正复不少，犹待于他本之校勘焉”，显然也属节本系统。《浙江采集遗书总录》丁集所云也能印证黄丕烈的判断：“又尝见别本载有元子真子跋，谓以蜀本相对，此有者彼无，彼有者此无，又深以为疑。又清隐老人跋则言：‘原序作三万五千言，事实若干，列卷十，今本止一万五千言，事实二百五十有七，亦列卷十。’所以子真子跋云：‘因取曾公《类说》所收者，摘抄事实五十一条，以作补遗。’”我们查阅过上海图书馆所藏明抄本，即是正文十卷补遗一卷，也是节本。其卷末过录元延祐丙辰子真子跋语云：“以蜀本对，皆不同，此所有者，蜀本不载，彼所载者，此亦不收，兼无序可考”；又过录明洪武五年清隐老人跋语云：“余家所有曾公《类说》所收事实八十校之，今本所无者凡二千余言，事实五十有一，作补遗录于右。”属于同一节本系统的还有清毛斧季校钞本，《文禄堂访书记》卷三著录该书十卷，补遗一卷。除了这一系统以外，《四库总目提要》还说：“别有一本，从曾慥《类说》中摘录成帙，半经删削，阙漏尤甚。”这种节本系出《类说》，也即黄尧圃所说的“摘本”。

次说足本系统。这一系统是否出自元子真子跋中所说的蜀本，虽不能肯定，但蜀本与元子真子题跋本（即明清隐老人题跋本的祖本）显然不同，而由清隐老人题跋本一脉相承的本子，据上引黄丕烈所说都“删削过半”，则蜀本似乎反而应该是足本。而黄丕

烈收藏的明刻残本肯定属于足本系统，《莞圃藏书题识》云：“余每以不得刻本为憾。去冬有书友携一本来，因世间此刻甚少，疑为宋本，故索直颇昂。余亦重其希有，以青蚨二千钱易之。惜首缺甲乙二卷，在乾隆辛酉时已不能钞补，则刻本之希有，益可知矣。今春往晤周香严，询及是书，云有刻本，急假归，倩友陈敬明兄影钞，以成完书。周本系虞山钱曾遵王藏书，故卷首有遵王手录钱明逸序，卷中多校改之字，又为何心友所藏而孟公覆勘者。”黄丕烈的这一明刊残刻补钞本，如其《莞圃藏书题识》所自诩，“世无宋刻，则此刻居然最先之本”。此本后辗转归陆心源丽宋楼皮藏，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。它与明崇祯高承埏的稽古堂刊本之间是否有递承关系，尚待确证，但两者无疑都是足本。因为《浙江采集遗书总录》丁集转引吴焯跋语云：“余所藏高承埏旧本较多于此三倍，即补遗诸条咸在，计件系之事，凡八百数十则。”《浙江采集遗书总录》丁集还说：“今鲍氏所藏正与吴跋相符，自甲至癸，凡十集；盖完书也。”鲍氏，即知不足斋主人鲍廷博，而其所藏《南部新书》即为清修四库所著录。《四库总目提要》云：“此本共八百余条，首尾完具，以诸本并校，皆不及其全备，当为足本矣。”据此，有理由认为：吴焯所藏稽古堂刊本、鲍氏知不足斋抄本与黄丕烈所藏明刻钞补本实际上出自同一祖本，这一祖本或许即是元子真子跋所说的蜀本。

属于同一足本系统的还有学津讨原本和拜经楼藏旧钞本。据张海鹏跋语，学津讨原本是从黄丕烈士礼居所藏明刊残刻补钞本录出，“共八百五十七条，与《四库总目》所称八百余条适合”。至于拜经楼藏旧钞本，据《拜经楼藏书题跋记》说，则“从录饮先生借手钞本，照录诸家校勘于上”，“复从著书斋借稽古堂刊本重校”。录饮先生即鲍廷博，可见拜经楼所藏由吴槎客手校的这部旧钞本也与稽古堂刊本、鲍氏知不足斋抄本同出一源。

同属足本系统的还有粤雅堂丛书本，但该本（下转第144页）

- ⑨（宋）朱熹：《名臣言行录后集》卷四，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- ⑩（元）杨维桢：《铁崖先生古乐府》卷十四“宫词”。
- ⑪（宋）彭乘：《续墨客挥犀》卷五，红豆山房本。
- ⑫（宋）洪迈：《夷坚志乙》卷四，中华书局，1981年，822页。
- ⑬（宋）蔡絛：《铁围山丛谈》卷三，中华书局，1983年，59页。
- ⑭（明）朱权：《太和正音谱》：“付末，古谓苍鹤，……执榼瓜以扑靛（参军）是也。”《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》本。
- ⑮（宋）赵彦卫：《东巡记》，《说郛》卷三十九，宛委山堂本。
- ⑯（宋）赵鼎：《建炎笔录》卷一，《丛书集成》本。
- ⑰《文献通考》卷一百四十六“乐十九”：“高宗建炎初，省教坊；绍兴十四年复置；……绍兴末复省。”
- ⑱侯百朋：《瓯歌与温州戏文》，温州艺术研究所编《南戏探讨集》六、七辑合刊，1992年，68页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广州大学人文学院

（上接第108页）

传承线索不甚明了，伍崇曜道光三十年（1850）的跋语仅说：“慈铁孙太守自浙中以钞本邮寄，玉生广文爰出旧藏写本互勘而重梓焉。”而对赖以互勘的钞本、写本所自出却一无交代，故而难以进一步考证。但我们以粤雅堂本与四库文渊阁本、学津讨原本互勘时，粤雅堂本能纠补学津讨原本讹误之处，颇多能从文渊阁本得到印证，故可推断它学津讨原本虽同属足本，却分属不同的子系统，而与四库本倒同出一系。值得指出的是，铁孙即徐荣，以官终杭嘉湖道故称太守，故而最有可能向居于辖境嘉兴桐乡的知识后人借抄，当然，也不能排除抄录在杭州的四库文渊阁本的可能。此外，上海图书馆所藏过录清吴翌凤跋本十卷，无补遗，也属于足本系统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